

## 第七章 持节欧洲

依照相关规定,驻外公使上任有权在中国政府管辖的铁路线上使用专车。自北京驶往奉天的旅途中,轻松舒适,只是由于专车载重很轻而略感有些晃动。车行至哈尔滨,恰遇大雪纷飞,遂停留数小时。承朋友盛情,摆下俄式大餐招待我们一行。此后横穿西伯利亚漫长的旅行,备感平淡乏味,窗外只能看到一片白茫茫的冰雪世界。

这次赴任途中,我决定游览一下莫斯科。我们下榻于都市饭店,小住三日。我后来曾多次住过该饭店,目睹了周围的兴衰变迁。沙皇鼎盛时期,尽管莫斯科不是都城,却是一座美丽如画、繁荣兴旺的城市。即以这家饭店内的生活而论,其设施用品的奢华足与西欧著名饭店相媲美。

我们一行有幸在星期日早晨前往大教堂参观。在人群拥挤之中,聆听着美妙的音乐。我们看见一些牧师布置方伎以迎合人们的迷信心态,如:扮作天使,为礼拜者指点迷津,暗示归宿;或是指某物为上帝遗物,置入玻璃匣内,引导信徒吻拜。如此伎俩,殊为荒诞可笑,与我国寺庙愚弄善男信女的方式如出一辙。我们还逛了几处华贵有名的皮货店,以及一些食品店。在食品店内,竟然看到许多进口的、价钱昂贵的亚热带水果。导游还带我们去了一家有名的餐馆用餐,那里有鱼汤、乳猪、鱼子酱等菜。

我国驻德国柏林公使馆的庶务总管亲自到莫斯科迎候我们一

行，于是，我们一同前往华沙。在华沙停留的几个小时时间里，由于要到另一个火车站换乘火车，故穿城而过，得以略观该城风光。这位庶务总管年岁较大，非常出色，他虽然是德国人而且从未到过中国，但是可以讲相当流利的北京话。他从童年时代就在中国公使馆工作，至今已有 40 多年。他还会讲一些俄文和法文。他既是生活起居服务的好管家，也是我们旅行中极为称职的向导。我国早年派往德国的每一位公使，他都很熟悉。

我国驻德国公使馆位于柏林的库弗斯丹达 (Kurfürstendamm)，地处夏洛滕堡区的时髦住宅街道内。到 1913 年，该地段出现了许多商店和咖啡馆而变得非常热闹，因此，不再适合作为外交驻所。但困难的是该馆舍的产权属于中国政府，很难售出一个好的价格，以便获得充足费用在其他地区另购房产作为公使馆。现有这座公使馆是一座四层的公寓式建筑，尽管其每层都有许多房间，但房间狭小，不够宽敞堂皇，难以达到官方款待宾客的规格。另外，这些房屋越来越陈旧，其风格和设施均已过时，换句话说，已不再适合使馆的需要。过去公使馆参赞秘书人员比较多（有时多达 30 多人）。他们对欧洲生活方式不习惯，被迫同住在使馆内。因此，一层作为公使馆的办事处、办公室，二层、三层安排公使一家，四层供一般工作人员使用，工作人员多系未婚人员和低级职员。这样安排楼层、房间可能是为了更方便。当时惟一可做的事情就是翻新、装修公用房屋，再用我带去的家具等物布置装点房间，使其显得更像样一些。

当时，中华民国还没有被任何列强所承认。所以我无法递交国书。不过承认中华民国只是个时间问题。事实上，我已经是中国公使，德国外交大臣冯·亚古先生 (Herr von Jagow) 和他的助手

齐莫尔曼(Zimmermann)博士召见了我，齐莫尔曼博士特别热情，他曾任德国驻天津总领事。我还拜访了礼宾司司长察恩先生和远东司司长格拉夫·冯·蒙特格拉斯先生(Herr Graf von Montgelas)，后者曾出任德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参赞。在柏林，外交使团规模特别庞大，除了各国的使节以外，还有许多从德意志各邦来的使节，这一现象在其他国家的首都是没有的。因此，我只选择拜访了担任使团团长的西班牙大使，以及美国大使雷息曼先生(Leischman)，从这两位先生那里了解到有关当地的社会交际和外交礼仪习惯。

和一般新官上任的惯例相反，我对使馆人员几乎未作任何调整。他们都知道各自的职责，熟悉柏林的生活，其中几位德语讲得很流利。所有这些职员都能恪尽职守，工作相当有效。我还留下一名德籍顾问，他负责校阅送给德国外交部的备忘录和一些文件（这些文件通常都用德文撰写）。更重要的文件由我亲自用英文起草。按照当时柏林的习惯，假如一位非法语为母语的外国公使，如用法语给德国外交部呈文，该部则用法语回答。但如公使使用本国语言呈文，外交部则用德文回复，简言之，执行相互对等原则。不过，如果法国大使用法文给德国外交部呈文，则德国外交部用德文回复。因为各自均使用本国的语言。只有非法语为母语的国家使用法语时，则法语当成外交用语。中国公使习惯递交中文书写的文件，并附有德文译本对照。后来逐渐抛弃了这种繁琐的形式，而只采用欧洲语言。

有一则关于俄国大使的故事。这位大使曾用俄文致函德国宰相俾斯麦，之后渺无音信，正在抱怨之中，他有机会见到了这位铁血宰相，问起是否收到他的信件，宰相问他用什么文字写的信函，

这位大使回答：“俄文。”宰相说：“哦！现在我记起来了，外交部曾经收到了一些用无法认识的文字写来的文件，所以都扔到废纸篓里了。”

当时使馆的日常工作有一项是照管公派和自费留德学生（大约有50人），并照管在德国的华侨（其中多为商贩）以及在萨摩亚群岛上的华工。在萨摩亚群岛，我国设有领事。使馆的二等秘书负责留德学生事务。学生中的某些事情很难处理，尤其是有些学生要求借款，常有麻烦。二次革命之后，各省官方派遣的留学生遭国内停寄学费，还有一些自费学生与家中断绝音讯，或没有收到生活费，因此皆要求使馆借款。而公使馆没有此种款项的支出，尽管在管辖权限之内，也愿意照看他们，但也无能为力。使馆曾向国内各有关当事人发电报联系此事，但没有回音，更没有收到汇款。

当时的德国经济繁荣，国力鼎盛。从城市的清洁及整齐有序的角度来看柏林，其确是一座优美的城市。入夜，大街上灯火通明，有如白昼。近郊园圃名胜林立，尤其是从柏林到波茨坦一带游览胜地星罗棋布，景色迷人。在柏林城内，使人驻足留连的是皇宫、博物馆、豪华大饭店、大百货店、剧场、歌剧院以及公园和花园。我在柏林居住四年之久，与其他欧洲国家的首都相比，对柏林更为熟悉。我偕夫人常去皇家歌剧院和皇家大戏院度过许多美好的夜晚，尤其喜欢在那里欣赏德国作曲家的音乐。

当时在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上定期行驶着快车。许多想去欧洲访问的人都乘坐这趟火车，柏林市是必经之地。我国官方信函和私人信件、报纸亦随搭这一线路传送，从不衍期，所以，使馆消息灵通，并不觉得祖国在万里之外。国内发生的事件，很快就能传递过来。这确实令我感到欣慰，与以前我在华盛顿的感觉有如天壤

之别。当年在华盛顿，与国内的通讯既慢，花费还昂贵，感到非常困难。在柏林了解新闻，不仅有德国的报纸，大使馆还订了《伦敦泰晤士报》和《纽约先驱报》的巴黎版。这两份报纸水平较高，至少不亚于德国的《汇报》，《汇报》像《法兰克福时报》一样，在外事报道方面做得比较出色。

我在中学、大学时曾经学过外语，近来在德国牧师的帮助下，外语有了长足进步。后来发现，尤其是与外交使团交往时，仅靠英语是远远不够用的，因之开始学习法语。由于法文语法和词汇与德文相比容易得多，最终，我的法文程度远胜于德文。大多数人感觉法文更容易为人接受，语法更简单，文体更易懂。如果是学习过拉丁文的人再学习法文就更显轻松自如。对于爱好文学，尤其是喜欢小说的人来说，法文为其打开了一个无限广阔的领域，他可以展开想像的翅膀，从中任意挑选诗文精品名著，以供欣赏玩味。每天翻检巴黎版的《纽约先驱报》，阅读用法文编写的版面，的确是掌握法文，尤其是在外交和政治场合使用的法文单词的最好的方法。

1913年7月在海牙召开了第二次禁止鸦片会议。我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会议。伍连德博士也是中国代表，他曾出席了1909年在上海召开的禁止鸦片委员会会议以及1912年在海牙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他对大会议题极为熟悉。我有幸参加此次会议，增长了极富价值的经验，殊感欣慰，还借开会之机结识了许多外交人物，并顺道游览了荷兰。与会各国共同签署了一份议定书之后，遂宣告会议结束。该议定书的主要目的是敦促尚未执行1912年国际禁止鸦片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禁止鸦片公约的国家尽快执行，呼吁原签字国政府尽快批准。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履行公约，其原因有两个，首先，在国内禁烟更易推行，由于没有了列强的阻挠，

在租界和租借地内也可以同样执行严格的禁烟法。其次，也可让大陆以外的华人，尤其是居住在南洋、香港、台湾、荷属殖民地等地吸食鸦片的中国人戒掉恶习。尽管这个公约并不像中国期待的那样彻底圆满，但确实提供了一个在欧属殖民地中，严格控制鸦片贸易和禁止吸食鸦片的公约。在上述那些地方的烟民主要是中国人。事实上，殖民政府不会甘心放弃对麻醉品贩卖中的税收以及吸食鸦片人的登记税等收入的。这种邪恶税收可谓无耻之尤。生产鸦片的国家除了印度以外，还有土耳其和伊朗，它们都竭尽全力阻挠执行禁止鸦片的国际法规的执行。更糟糕的是一些比鸦片更厉害的麻醉剂——吗啡、可卡因及其衍生物等，以更快的速度传播、使用，致使一些白种人也沉溺其中，成为吸毒者。那些对制造毒品极为眷恋的国家竭力反对控制或削减毒品。尽管美国政府尽了最大努力，其他大多数国家口头上也支持根除吸食鸦片和类似的毒品的恶习，但收效甚微。

1914年6月召开了第三次大会，会期10天。会议又签署了一个议定书。虽然承认公约的签字国有所增加，但是禁烟成效仍微乎其微。不久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禁烟问题遂湮没无闻，再也无人理睬。不过，那次会议期间还有更令人可笑的观点提出——有人认为罂粟壳是一种制造面包的香料，使用无害，要求不要将其列入禁止之列。

一战结束时，得知美国国务卿罗伯特·兰辛先生将作为美国代表出席和会，我立即致函于他，建议把签署、批准1913年禁止鸦片作为协约国与同盟国签定和平条约的一项谈判条件。兰辛先生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建议。不幸的是，在国际联盟主持下，战胜国和战败国对于禁止鸦片问题，在日内瓦举行了多次会议进行讨论，然

而均因不愿意放弃在税收上的利益，无人真心实意地彻底禁止鸦片及其带来的罪恶。也许再来一场比一战更为可怕、代价更为惨重的战争，才可能唤醒各国政府和人民的良知，将那些已经变成整个世界威胁的所有毒品、邪恶统统消灭。

是年，德国公主（德皇的女儿）与不伦瑞克公爵结婚，邀请各国使团参加庆典。虽然德国外交部暗示各国驻德贵宾也在邀请之列，但无人看重此事，经我国政府批准，我偕夫人一起到比利时和法国去旅游。这样一方面可与同事相聚，另一方面也可借机离开柏林。当年夏天，我国驻欧洲各国公使齐集日内瓦开会，商讨对外方针，向政府提出建议。当时中国的外交总长是我的内兄孙宝琦先生。

尽管中国和列强之间还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需要处理，但列强承认民国已经指日可待，当时，中国同意给予德国在山东建设两条铁路、延长胶济铁路的特权。中国愿意重新与俄国就外蒙问题谈判，并且最终签署了一个协定。5月份，美国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承认中华民国。我奉命拜访了这些国家驻柏林的使节。欧洲列强则是在第一届国会正式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之后，才于10月6日开始承认民国的。

德国承认中国政府后，我没有被德国皇帝立刻召见。因为当时是冬季，德皇不在柏林居住，直至第二年的3月底，才接通知，德皇将在波茨坦行宫接见我。我和齐莫尔曼博士乘同一列火车前往波茨坦。下车时，皇家礼宾车已在车站迎候。旋即驱车前往行宫，在一间会客厅内等候几分钟后，德国皇帝陛下身着戎装独自来到厅内。进行了递交国书前的礼仪寒暄后，德国皇帝接受了我递交的国书，并立即转递给齐莫尔曼博士。然后宾主开始非正式的谈

话。他详细论述了交通对中国的至关重要，尤其是建设铁路的重大作用，其本意无非是说明最近德国外交大臣向中国政府要求在山东建设新铁路的特许权的理由是正当的，情有可原的。接着，他就颂扬德国工程师在建设津浦铁路北段和修建济南附近黄河大桥过程中的功绩。突然他转头问齐莫尔曼博士，那位工程师叫什么名字，齐莫尔曼博士自然不记得了，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问得有些尴尬。皇帝陛下略加思索后，大声说：“对了，对了，他不是姓‘多格穆勒’吗？”齐莫尔曼博士顺从地回答说：“是，是，陛下。”德国皇帝的无所不知给新任中国公使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柏林递交国书之后不久，我又去丹麦和瑞典，执行同样的任务。两国接待礼典仪式更为隆重、精彩。丹麦国的典礼官与我及随行人员（在哥本哈根我国亦有常设的公使馆）乘坐旧式四轮宫廷马车，驾车人身穿华丽礼服，驱车前往皇宫。到达皇宫时，侍从长已在宫殿台阶上迎候，首先领我一人来到丹麦国王陛下御前，外交大臣没有在场，我将国书直接呈递给国王陛下，然后进行了简短的谈话。随行人员也被引到国王面前，由我一一介绍，行礼而过。斯德哥尔摩的仪式与哥本哈根非常相似。查阅印制成文的该国国王接受外国使节拜会之礼仪定则，我们了解到，如是大使身份（当时在这些国家中我们尚无大使驻扎），呈递国书应乘四轮马车，驾车人应戴着不同颜色花结的礼帽，侍从官则应走到台阶下面迎候，等等。

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外交大臣原是一位富裕的银行家，他的同父异母兄弟曾任瑞典驻北京公使。他的款待令我非常感动。后来参加典礼官夫妇举行的宴会时，我看到绘有中国图案的瓷制餐具光彩夺目，印象非常深刻，这些瓷制餐具似乎是在瑞典先作好胚

胎,然后装船运到中国,再在那里绘彩、上釉,烧制而成。

按照君主制国家的惯例,外国公使在受到国王接见之后,还要向王储致意,我有幸与瑞典王储卡尔殿下见面。他对红十字会工作兴趣浓厚。我还见到了丹麦王储威鲁德玛(Waldemar)殿下,他曾访问过中国。这两个国家对中国仅有商业上的兴趣,瑞典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纸张和木浆,丹麦在中国设有电缆公司。

这是我第一次访问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两国首都皆环境优雅,经济繁荣。富丽堂皇的建筑物、干净的街道、豪华的旅馆、精美的大戏院和高水准的生活水平都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在欧洲大陆的国家中,除了瑞士以外,我回想不出有任何国家能像这两个国家的人民那样过着富裕、快乐的生活。瑞典的主要问题是气候寒冷,冬季日照不足,白天到下午两点钟,天色就已昏暗。后来,我在夏季又访问该国,在斯德哥尔摩又看到几乎没有黑夜,黄昏之后,只经一个小时,太阳就又升起来了。然而,瑞典作为一个国家给访问者印象尤深的是,人口适中,工业发达,有着辉煌的过去,而且有实力不断发展。在许多方面,瑞典人民很像它的邻国德国的人民。

在柏林,负责加强与亚洲国家社会、文化交往的重要的社团组织是德亚协会(The German-Asiatic Association),会长是哥尔兹陆军元帅(von de Goltz)。他曾担任土耳其军事顾问多年。凡有从中国、日本、土耳其、暹罗(泰国)、或波斯(伊朗)到德国的新的外交使节,他总以该协会的名义举行正式的招待会。至于那些在中国有企业的德国商行,例如德华银行、礼和洋行、安诺洋行等在柏林的总经理均不时地向我国公使致意结好。

柏林的社交旺季是从元月一日到三月底止,时间不长但令人

眼花缭乱。作为新到之人，我首次参加这里的交际活动时感到相当的快乐有趣。我经常应邀出席晚宴、午餐、品茗、欣赏音乐等活动。邀请者除德国政府的一些大臣，还有外交使团的使节。短短的时间里，我不但与外交界人物相会，也有机会结交许多显要人物，例如海军元帅蒂尔皮茨（von Tirpitz）、法尔肯海因将军（von Falkenheyn）、殖民大臣沙尔福（Solf）、海军上将特卢布尔（von Truppel）、德恩堡长官阁下（Herr Dernburg）和其他人士。他们曾以总督或大臣的身份到过青岛或北京。本世纪初，法尔肯海因将军曾应张之洞总督之邀，担任军事顾问，他对中国很友好。这位海军上将虽然年事已高，但身体强健，喜欢谈论有关青岛的事情。

几乎所有的德国高级官员都懂英语，虽然略带一点口音，但都能准确而流利地交谈。在外国使团中，法国大使朱利叶斯·康邦先生（Jules Cambon）在战争爆发后离开德国时，遇到许多不愉快的事情。日本大使只讲法语，与我们交谈存在不少困难，我的夫人不得不充当翻译。各国公使当中，古巴公使奎萨达先生在华盛顿时和我即已相识，后来我还与丹麦大使莫奇伯爵成为知己，他与一位美国女人结为了夫妻。土耳其公使和波斯（伊朗）大使皆和蔼可亲，我们有时在德亚协会活动时相见。土耳其公使在谈到他的国家摆脱软弱、屈辱的经验时，非常激动，他宣称，谈判纯属浪费时间，惟一成功的方法是使军事强大起来，以后的历史发展证实他的观点绝对无误。

当时西班牙大使是驻德外交使团团长，他的资历最深，我从他那里听到了许多关于欧洲已潜伏严重危机的深刻见解。有一次，我问他：“以您的高级官员职责，是否经常拜会德国宰相？”他说：“有过，但是很少，宰相只是形式上的国家外交事务负责人（我想，

就像前清时的庆亲王一样。——作者注),实际掌管交涉的是外交大臣。当然,如果要解决问题,还不如向本国政府报告,称已经使事情为德政府高层所注意。”

当时柏林的宫廷朝仪,铺张而庄重。正式的大型社交活动场面蔚为壮观。重要的宫廷活动有三种,“作乐特本可尔(The Trep-pencour)”、“庆祝德皇寿辰”、“宫廷舞会”。第一种活动中,有二千宾客参加,按照他们的身份依次排成长队慢慢地穿过皇宫庭院,最后进到一座小殿之内,皇帝和皇后站在里面,接见每一个人。各国使节及其随从人员,由礼宾官向皇帝陛下、皇后一一引见。所有的人最后都走到一座宽敞的客厅内,里面为客人准备了茶点,人们在此稍事休息,最后散去。这种集会活动中,帝、后以及皇室成员都要站立两个多小时,一一接受国内外贵宾的敬意、问候。这一定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庆祝德皇寿辰是由宰相夫妇举行宴会,招待各国使节,时间为下午五时半,宰相夫人是宴会中惟一的女性。盛宴之后,所有人都要前往皇家歌剧院观看盛大演出,使节和夫人都要参加这一活动。德皇偕皇后及皇室成员到场共庆。节目演出时间较短,结束后,皇帝陛下在剧院楼上厅内与来宾寒暄。我的夫人身着中式礼服,她的服饰颇惹人注目,似乎也引起了陛下的注意!他走过来与我们亲切谈话,当时正值我国二次革命开始不久,在长江上发生了中德冲突事件,一德国炮艇向我国革命军占领的要塞开火。德皇极力为这种极端违反国际公法的行动辩解,竟说“这是在表示支持袁世凯大总统”。

宫廷舞会有许多人参加,而且都穿规定的礼服,显得雍容华贵,色彩艳丽。当所有的客人到齐以后,皇帝陛下和皇后由大礼官

引导慢步进入大厅，亲王、皇子、皇妃、公主等皇亲尾随而进。厅内的先生、女士们依次站立两旁，恭候皇帝、皇后经过。走到每位大使面前时，德皇寒暄几句，经过全权公使时，点头致意。最后，他走到大厅正中贴墙摆放的御座上就坐，不时召唤宾客前来与他交谈。

当时欧洲局势已经危机四伏，剑拔弩张。当日晚上，德皇请比利时公使到座前相谈，长达一小时之久，许多眼睛都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舞会中，客人们还欣赏了青年军官和他们的舞伴们表演的集体舞。最后是晚宴。重要的客人按桌就餐，大使们和皇亲、贵宾在同一厅内，公使在相邻的房间内。其他的客人则另辟一室享用自助餐。这一年夏天，由于一战爆发，除了小规模的非正式聚会以外，再没有更多的官方大型聚会，作为一个群体，外交官彼此之间相见也变得很少了。

1914年8月1日，各中立国的大使、公使都被邀请到柏林皇宫的白厅，德国议会的议长及重要议员，包括社会民主党的成员都在座。大约中午时分，德皇身着白色戎装来到厅中，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声称法国军队越过了德国边境，两国之间已经进入战争状态。整个德国应团结在他周围，从现在起，不再计较党派分歧。他与所有的德意志领导人握手，包括他以前所憎恨、鄙视的社会民主党人。当我离开白厅的之际，遇到了法尔肯海因将军，便顺口对他说：“你任此职，今后一定很忙碌了。”他笑着回答道：“不，不忙，电钮已经按下去了，对我来说就没什么事情可做了，每件事都会自动地进行下去。”实际上，德国战争机器已经开始启动，其军事组织极其严密，以至于不需要临阵指导，至少是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是不需要高层决策加以指导的。

当时日本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尚属暧昧，但谣传它将成为三国

同盟中的一员。一群德国人到日本驻德大使馆门前，面对太阳旗欢呼，当时日本大使未在馆内，仅由代办出现在阳台上，见到德国人此种举动，不免让日本人感到尴尬。我国使馆有一名工作人员，长相看上去有点像日本人，他在夏洛滕堡区内走路时，误被认作日本人，不管他如何声明、抗议，仍被德国人抬上肩以表亲热。后来德国人对日本人态度突变，竟然把在街上行走的暹罗（泰国）公使当成日本人，肆意侮辱，引起暹罗（泰国）的强烈抗议。

上述事件似乎说明德国人民不能正确判断欧洲大陆一旦发生战争，英国和日本所采取的态度。战争发生之前的那个冬天，在外交使团中也常就这一问题讨论。德国政府几乎从来没有研究过英国保持中立的可能性或必然性的问题，后来披露的文件中证明，当时驻伦敦的德国大使给德政府提供的情报不准确，他对形势的看法太乐观，太倾向于英国将保持中立的观点。

我国公使馆地处柏林的一条商业街上，所见所闻比较容易看出人们对这场战争的情绪。战争初期，比利时的要塞一个接着一个地落入德军手中，人们的激情达到狂热状态，咖啡馆、饭店、酒吧里彻夜不停地激荡着欢呼声、歌声，以至吵得我们无法入睡。新闻界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下，煽动公众的激情，根据政府的意愿，在一两天之内常常可以转变公众的看法，对人们产生巨大的影响。主要敌人先是法国人，再是英国人，最后是美国人。宣传机构的一句话，就可使报纸上恶意丑化的国家在一天之内由甲国变成乙国。而民众缺少见识，无从仔细思考就立刻附和当局的愿望作出反应。没有比这些被谎言迷惑而处于完全无知状态中、让人牵着鼻子走的人更可怜的了。舆论导向的威力再没有比参战诸国彼此之间相互谴责的日子里表现得更淋漓尽致的了。

8月份,日本已经准备对德国宣战。当时日本要求德国战舰从中国和日本海域撤出,并要求于9月19日前将其在胶州湾的租借地交出来。我自外交部接到指示,令我立刻询问德国政府是否愿意就此将租借地归还中国,以避免在远东流血。我遂前往德外交部拜见齐莫尔曼博士和海军部副大臣,尽管两人都认为我陈述的理由很有说服力,也与原来的租借条款相一致,但是仍回答说,既然日本人已经发出了最后通牒,再考虑中国的建议为时已晚,况且按照德国的传统习惯,任何挂着皇家旗帜的驻防区都不能未经抵抗就撤出。他们承认,以3000德军对付整个日本海军和10万陆军,在青岛防守是毫无希望的,但由于上述原因,一场恶战将难以避免。

最后他们声明,青岛的命运取决于欧洲战场的情况,他们坚信德国将取得最终的胜利。事后有些著作中提到中国政府没有尽力对日本行动采取措施,或是说袁大总统宣布中立反而束缚了中国的手脚等等,这些说法都经不住推敲。中国的交涉并不是声明反对德国,而是出于友好的意愿,目的是维持远东的和平,收回合法拥有的租借领土,阻止和避免日本人以此为借口用武力占领青岛。

战争爆发后,许多留学生离开德国回国,继续留在德国实属不明智的选择。其他的旅德中国人也都决定离开,除了使馆人员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中国人再滞留于此。随着战争的延续,生活条件变得越来越糟,所有的食品都按定量配给,没有配给证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即使有证也不一定保证所需的食品、用物都能买到。最初,每周都有一天没有肉吃,当时鸡蛋、黄油已经奇缺,其后,茶叶、咖啡、白糖和中国人喜吃的大米,也都很难买到。就连德国人的主食——马铃薯也变成了稀罕之物,取而代之的是难以下咽的芜菁。

通常欧洲人对肉和鱼的选择,更喜欢吃肉。随着战争月复一月的延续,鱼成为更主要的食物,其后,鱼的供应亦显紧张。

幸运的是大使馆所需的香肠、黄油、面粉、白糖、茶叶、咖啡都能由哥本哈根的我国驻丹麦大使馆定期供给。每次我前往哥本哈根或其他中立国如荷兰,回来时也带回大量的食物,包括奶酪、糖、巧克力和火腿等。总之,我们的生活还算比较舒适,而我们的德国朋友或是邻居就远非这样幸运。1916年的冬天非常寒冷,为了得到取暖用的煤,我们只得请求德国外交部协助解决,总算官方比较负责,慷慨地给予了解决。

战争进行了一年左右,由于缺乏食物而且烹饪技术差,饭店、咖啡厅失去了昔日的繁荣,一切都无法与战前相比。在咖啡厅里,不仅咖啡质量很差,而且几乎没有白糖,替代品是糖精颗粒。据说,所谓咖啡实际上是用烘烤干的苹果皮制作的。茶叶则是泡过一次之后,捞出来再用几次后才扔掉。这种现象证明了海上强国对同盟国的封锁效果。有一次我在中立国家过圣诞节,带回几支火腿,未加思索就把其中一支当成礼物送给了德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他非常感谢,元旦亲自来访,并赠予贺卡。后来他承认,已有几年没有吃到火腿了,现在再次品尝到它,顿感鲜美无比。

我访问斯德哥尔摩期间,有一位在我任外交部次长时就曾相识的协约国驻北京大使路过此城,约我在旅馆相见。他希望了解德国的食物供应情况。我遂略作介绍:战前德国人餐桌上甚为丰盛,主餐有四道菜,以喝汤开始,吃点心结束。开战一年以后,主餐由四道减为三道,后来又从三道减为两道,不过离饥饿线尚有些距离。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生活水准较低的国家,结果会大不相同,若平时只有两道,甚至只是一道食品,在战争条件下要减少食物,

则无从减起,再减将是无物可食,处于饥饿状态。

就食物分配而言,战争在道德上带来了一些不好的影响。那些上层社会的家庭主妇们平时绝对道貌岸然,而在战时对自己存储的黄油、白糖、面粉的实际数量则隐瞒不报,为维系自己的生活水准有如战前一样,面对食物供给短缺的局势,可以不顾尊贵的身份,迫不得已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平日常见易得而战时难觅的东西。事实上,除非有过这种经历的人,否则很难体会到战争的紧急状态给人们在精神上、智力上、体力上所带来的痛苦。

旅居德国的最初几年里,我出游过两次,有幸参观了造船企业和军火企业。一次是去东普鲁士的埃尔平,代表我国海军部审查我国定购的鱼雷驱逐舰。我们观察了舰艇的速度,大约是30节,即每小时30海里,虽然舰艇是在内港的平静水域里航行,由于航速起落关系,站在甲板上两手紧握住栏杆,仍然感到上下颠簸,难以忍受。据我所知,两艘驱逐舰将很快交到中国政府手中,而剩余的舰艇则因欧战爆发而羁留于此。在回来的路上,我们参观了但泽港,这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有著名的市政厅和大海豚。

另一次出行是去埃森城,参观著名的克虏伯工厂。我们花了三天的时间参观了该厂的各个部门,见到了该厂创始人克虏伯(现任厂主的祖父)时代使用的古老炼铁炉。克虏伯工厂占据了埃森城的一半,一座设施占据半座城市那么大的地方,就我所见惟一能与之媲美的城市就是中国山东的曲阜了,在那里,宏伟壮观的孔庙和孔府占据了曲阜城的一半。波伦先生款待了我们(他与弗若琳·克虏伯结婚后,改姓克虏伯)。他曾是一位技艺高超、成绩卓著的运动员,在招待我们就餐时,大餐桌上摆放了许多金杯,都是他在快艇比赛中获得的荣誉。据说德皇曾授予他全权大使名誉头衔,

以便他应邀参加国宴时，可以坐在靠近皇帝的位置上。

在途经杜塞尔多夫、科隆和波恩的大学城返回柏林的途中，我们乘汽车穿过了鳞次栉比的工业城镇，这里是德国的重工业区。我们只在一处停下来，参观了炼钢高炉。这次旅行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世界工业中，德国占有重要地位，而克虏伯工厂则是德国的军火库。

由于爆发了战争，所有的社交活动陡然中止。中国人出访欧洲也不再取道柏林，凡从中国寄来或寄往中国的信件及其他邮件都绕道瑞典的哈帕兰达到达莫斯科，再走西伯利亚。所有的旅客包括那些往来于同盟国国家的人在内都得走这条路线。我们的外交活动受到制约，仅限于了解战争的进展，随时向本国政府报告而已。

外交使团能聚在一起的时候已少得可怜，即便有这种机会，也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出席。这为数不多的机会一次是奥地利皇帝逝世后，在天主教堂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另一次是陆军元帅哥尔兹去世。在后者的追悼仪式中还发生了德国总参谋长毛奇将军猝死的悲剧。当天，所有亚洲国家的外交官都出席了这位曾任德亚协会长的逝者的追悼会。在土耳其大使发表了简短的对逝者的赞美讲话后，刚从前方赶回来、在我前面就坐的毛奇将军站起来，走到前面发表讲话，以表示对先师的敬意，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在他坐下去的时候，心脏病发作，从椅子上滑到地板上，就这样突然身亡。会场一片混乱，集会在惊惶失措中结束。

还有一次，外交使团应邀参加柏林大教堂(The Dom)的礼拜。德国皇帝出席了这次活动，由著名的褚安道博士(Dr. Dryander)登坛讲道，他言辞甚是激烈，说上帝是站在德国这一边的。没过多

久，报纸又报导了敌对方的主教布道时的讲话，称神灵会真正帮助协约国的。

教会是否应该参与对战争是非的评判，是否应在人类的冲突中保持沉默，谨慎行事，没人愿意为此与教会争辩。对于教会，我们不能按一般人的逻辑加以理解。他们不管正确与否，总是支持自己的国家和教民。不过，既然教会声称自己是人类良知的代表，岂不是更应该主持公正，至少应是中立的。否则会迫使人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战争年代，即使教会中最高领袖好像也是把国家主义置于宗教的教义、学说、信仰之上，而并不自感荒谬和内疚。让上帝也卷入人类的冲突之中，挟一己之私利用宗教，这样做的结果只会增加宗教的耻辱。中国古代经典不也是在帝王建立的礼教中，为了统治的需要和管理的安全，而随意注解其义吗？

战争期间为了考察德国国内情况，也为了调节在柏林的单调生活，我安排了几次在德国境内的旅行。一次是由使馆参赞陪同去哈尔茨山旅游。正当我们在那里的一个旅馆内吃午饭时，进来一名军官，他以怀疑的目光盯了我们片刻，然后走过来突然要求我们一行人出示护照。他的行为极其无礼。我让使馆参赞质问他凭什么要检查我们的护照。这位参赞已在德国居住多年，讲一口流利的德语。军官对我们的质问顿感吃惊，就宣称是地方司令官的命令。我们的护照是由德外交部签署的，上面有德皇的名讳，他看了护照，知道我们的身份后感到十分窘迫，立刻敬礼，而后匆忙离去。后来旅馆老板告诉我们，在山中有许多疗养院，里面住着伤员，他们害怕国外报导这些消息，所以不欢迎外国人到这里来。

另一次是偕夫人一起出游，首先到了风景迷人、盛产鳟鱼的巨人山，在附近见到许多制造精美雕花玻璃葡萄酒杯的小工厂，雕刻

的图案主要是当地的雪景、冷杉树、麋鹿等等。回来的途中，参观了德累斯顿和莱比锡。我们在莱比锡时，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当时我们下火车后正要出站，跟随的德籍佣人走在前头去照看行李，突然一位年岁较大、身体肥胖、商人模样的德国旅客冲着我们大叫：“日本人！现在是打仗的时候，居然有日本人在莱比锡，真是闻所未闻！”我立刻向这位疯狂的家伙提出抗议并郑重告诉他，“我不是日本人，是驻德国柏林的中国公使！”他还继续叫嚷。我忍无可忍，就抓住他的大衣，揪他一起去见车站的警察。我向警察出示护照后，要求把这个人大管起来。回到旅馆，我就给柏林的外交部发去了电报提出抗议。看来，当局立即采取了行动。第二天早晨我们出游时就有警车陪伴，旅馆周围也有侦探站岗，以防再有人打搅我们。由于我已起诉这位疯狂分子骚扰外国公使，他写信向我解释他的行动完全出于爱国激情，请求我原谅，我回答说如果他愿意向德国红十字会捐助 200 马克的话，我将请求官方对其免于追究。于是，当事双方都同意按照此法处理了事。

德累斯顿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有极好的博物馆，馆内收藏了中国、日本、朝鲜各式各样的瓷器，比我见过的任何其他地方博物馆的藏品都丰富。有些瓷器甚至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也难找到。靠近德累斯顿的小城是迈斯尔，我们参观了那里的皇家瓷器厂。厂长带领我们绕厂参观，向我们介绍炉窑原址。他说迈斯尔的制瓷业源于一位炼金术士实验的结果。这位术士企图从一些矿石中提炼黄金，在提炼过程中发现了瓷土，后来证明其价值和黄金一样贵重。他让我们看了两个瓷盘，一个是乾隆官窑真品，另一个是仿造的，两个极为相似，实难区分真假。二者只有一点不同，即仿制品是用机器旋出来的圆形，其形状完美无缺，而真品是用手工操作

的，圆形稍有偏差。

在莱比锡博物馆，馆长让我们注意那些不同体积的圆纸筒，代表不同国家的纸张消耗量。我们看到代表中国的圆纸筒体积小得出奇，究其原因是他们只依据海关贸易统计数字，而不包括国产纸张的巨大消耗量，而中国国产纸的消耗量是相当可观的。

战争年代，波罗的海避暑胜地除了中立国的外交使节以外，一般不接待外国人。我们在一处青山依傍、美妙幽静的名为斯文蒙得的地方度过了两周，这是我们在德国海滨度过的惟一一次假期。由于战争仍在继续，而且又是夏末，海边游人甚少，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这里夜间灯火管制极严，军警整夜在沙滩上来回巡视，观察有哪栋房屋的灯光外泄。沿着沙滩两个方向都有修整好的道路，人们可以极为方便地穿行附近的游览区。

这次旅行令我终生难忘。首先，火车总是准点的，没有因为战争而使服务变得糟糕。几乎看不出战争的痕迹，例如伤病员，军用列车等等。当然，旅店几乎都空着，食物品质比较差，从人们流露出的那种沉寂而压抑的神情上也可以看出形势不太正常，而且人们的生活极为沉重。战争已经持续了三年，事实上，我们住在柏林，除了食品常遇麻烦，看见一些伤病员和民众精神抑郁以外，从来没有听到过枪声，没有看见一架外国飞机出现在柏林上空或是国家正处在战争中的任何其他迹象。但从许多方面都可以觉察到战略物资匮乏，许多德国家庭不得不交出家中的金属制品，尤其是铜制品。出租车的橡胶轮胎也必须捐献，只剩下铁轮在街上行驶，发出卡嗒嗒的噪声，道路因此被划出许多裂痕。

我的德文老师的体重渐渐下降，到 1917 年我们分手时，他穿的衣服显得特别肥大。我们有几位德籍佣人，其中只有一人正符

合服役年龄，虽由使馆出面交涉，让他推迟两年入伍，但最后仍未脱厄运，入伍仅一个月，就阵亡了，留下孤儿寡妇。

总的来看，战争期间德国政府对中国旅居德国人员比较宽厚，有时甚至超过了我们的期望。例如我国外交总长的夫人是比利时人，她想回到已被德军占领的布鲁塞尔市探亲。开始德国外交部副大臣说：“比利时人尽管已和其他国籍人结婚，但比利时人终归还是比利时人。”但最终德国政府还是允许她由瑞士进入德国，再转往比利时，她的行李还免受检查，享受外交豁免权。她的妹妹嫁给了一个英国人，姐妹俩获准同回比利时省亲。但其妹从瑞士进入德国国境时，从上到下受到严格的检查，包括让她散开头发，用长针穿刺她的鞋跟，检查里面是否隐藏违禁之物。

国际婚姻在战时显露出极大的麻烦。一位德国高级官员与一位英国女子结婚已经 50 多年了，战争爆发后在德国备受歧视，难以忍受，不得不移居瑞士。一位美国女士与德国军官结婚，在美国参战之后，一夜之间，名誉扫地，也不得不寻找其他地方避难。

我刚任德国公使时，有几位中国名流访问德国，小住几日。其中一位是袁大总统的长子袁克定；另一位是梁敦彦博士，前清外务部尚书，后任交通总长。袁先生的身体不太好，几年前曾从马上摔下来，伤势严重，落下脚跛残疾，访德的目的不太清楚，有些人猜测与袁大总统称帝的野心有关，袁公子极欲搞清欧洲国家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当时中华民国还没有被国际承认，我也处在等候呈递国书期间，而袁公子又仅是一位私人来访者，不可能受到德国官方正式的招待或与德方正式相互交换看法。不过我曾陪齐莫尔曼博士到郊区袁公子的住所作过一次礼节性拜访。不久他就无功而返，未有所获。

梁博士做袁大总统重要助手多年，他在万湖购买了一所漂亮的别墅和一艘摩托艇，以便饱览海上风光。此次德国之行，纯粹为了消闲度假，故避免与官方接触。和唐绍仪先生相反，他对中国改变国体没什么热情，尽管他是留美学生，但是思想保守，顽固坚持许多旧习俗，譬如过年时以及一些其他重要的场合，儿女必须向他叩头。他精通中文和英文，还是一位书法家，在北京接见外国使节时，他总讲中文，一方面是维护国家尊严，另一方面有翻译作缓冲，以防脱口而出的词句被外国使节抓住把柄。他与曾在苏格兰读过书并翻译出版儒家经典著作的辜鸿铭先生一起，在湖广总督张之洞幕中共事多年。

19世纪末，梁先生任张之洞的英文秘书。他常跟我谈这样一段经历：当时驻汉口的德国舰队司令官拜访总督，提出一些琐事纠缠，意在挑衅，以便借机挑起事端。经过了几周的时间，由于总督大人的机敏周旋，使他们没有找到任何可乘之机。一天德国司令官给梁先生留信告别。他极感意外，拆信一看，其中写道：“我们不再打扰总督阁下了，我们要立即驶往胶州湾，你们那里糊涂的老百姓杀死了我们的传教士。”随后的结果众所周知，胶州地区被德方占为租借地，山东境内建起德国的势力范围。

另一位途经柏林的名人是严范孙先生。他是前清的学部侍郎，民国政府几次邀他出任内阁总长，均遭严拒。他归田后，在家塾的基础上创办了南开大学。他在柏林停留了几日之后，便携袁大总统的两位公子去了伦敦，这两位公子拟进英校就读。

1915年1月，日本通过驻华公使日置益提交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经过中日双方数月谈判，同年5月，中国政府表示愿意接受修改后的条款。

不久，国内开始有人拥戴袁大总统进位皇帝，虽然公开的或暗中的反对一直存在，但要求实行帝制的声浪却甚嚣尘上。12月1日，袁大总统公开表态接受黄袍加身。中国驻外使馆接到非正式通知，要求在元旦之际给皇帝发贺电，而且须用前清上表皇帝的行文格式。许多人都遵命照办，我则忘记了昔日的贺表格式，就电请外交部次长代我拟表呈上。

第二年，即1916年，改元洪宪元年，新皇帝的登基大典已经准备就绪。但众所周知，由于西南各省和公众舆论的反对，帝制运动最终难以推行。3月，袁大总统不得不放弃帝制，但是，逼迫其下野的运动一直持续到6月袁大总统亡故，这场政治冲突才算平息。继由黎元洪副总统任大总统，恢复了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

1917年2月，齐莫尔曼博士约我到外交部会面，正式通知我，德国政府打算进行所谓的“无限制潜艇战”，德国迫不得已采取这种行动是为了对付协约国的封锁，希望中国对这一行动能够谅解。我迅速将此消息电告北京，随后奉命向德国提出严重抗议，中德关系出现裂痕，至3月全面破裂。

3月14日，大总统明令宣布中国与德意志帝国断绝外交关系。我奉命向德外交部递交正式绝交书，齐莫尔曼博士接受断交书时态度平静，对此举深表遗憾。长时间的战争使得德国人不再热情高涨与信心十足。中国幅员辽阔，有四亿人口，现在站到了协约国一边，实可壮其声威，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的深远意义都不容低估。尽管齐莫尔曼博士一再强调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德国，但在接受我国绝交书时不免情绪沮丧。他强调过去与中国的友好感情，并说作为个人愿意与我继续交往成为朋友。他答应照顾我们安全顺利地离开德国到达中立国（丹麦）。

遵照我国外交部的指示,我拜访了丹麦驻德国大使莫奇伯爵,请他在中国使团不在德国期间,负责照料有关中国在德的利益,我们留下二等参赞和随员各一人,协助莫奇伯爵处理事务。过了一段时间,使馆其他成员以及家属才乘专车抵达丹麦国境。显然,德国政府因不知德驻中国使馆人员最终能否安全返回,所以推迟了我们离境的时间。最终,一位德国军官护送我们安全离开德国到达丹麦,所以没有像许多交战国的外交人员在1914年撤离德国时那样狼狈,发生了种种意外。当天晚上,我们安全抵达哥本哈根。

大战期间,丹麦可谓世外桃源,生活安逸舒适。当时欧洲各国最主要的问题是缺乏食物。丹麦的农业闻名于世,物产丰富,肉、蛋、谷物、各种奶制品、水果、蔬菜应有尽有,种类繁多,供应充足。战争期间,该国是欧洲惟一能够享用白面包的国度。让我们奇怪的是,这里的许多人更喜欢吃褐色甚至黑色面包。丹麦对所有交战国一视同仁,恪守中立,因此是审时度势、综合战况进行分析的理想之所。这里与各交战国都有通讯联系,可以接收发电报、信函,从报纸上亦可获得各种新闻和各交战国的动向。当地报纸报道迅速而准确。丹麦文有点像英文和德文,学习起来不算费力,几个月之后就可阅读,受过教育的丹麦人都能够讲一种或两种外文,外国人没有必要学说丹麦语也能生活。由于丹麦语发音特殊,学好也很困难。

我国在哥本哈根设有使馆,平日由代办主持。他的住所就是大使馆办事处。由于战争避难者大量涌入,城里住房短缺。我们在霍尔特镇看中一幢别墅,该镇距首都10公里,乘火车或汽车进城方便快捷。这幢别墅坐落在紫湖湖滨,占地七、八英亩,并得到很好的规划,我们在此一住就是三年,我的一个女儿就在这里出

生。别墅附近有许多森林和乡间住所，乘车很快就可到达美丽的松得海峡。

附近是弗雷德里克斯城堡，堡内小教堂墙壁上悬挂着上千枚纹章，上面有所有丹尼博格骑士团成员的姓名，就像北京孔庙中的进士题名碑一样，几个世纪以来所有高中进士（翰林院）<sup>①</sup>的人都刻名于碑上。

由克隆贝格往北，我们看到了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墓地。因莎士比亚悲剧的上演，使哈姆雷特闻名天下。我们用从柏林运来的家具布置临时住所，安排得极为舒适。家中有四位中国佣人，其中一位厨师和一位男仆是随俄国驻烟台领事出国的，后来遭辞退，流落街头，无事可作，自己找上门来当佣人。我们有生以来还第一次养宠物，是一只漂亮的丹麦猎犬，两只眼睛颜色不同，个头大得像头小牛，和小孩子们游戏的时候，极易把孩子撞倒。它有个坏毛病，就是喜欢追趕路过的骑自行车的人，闯祸后往往让我们不得不花钱赔偿人家的损失。

由于战事的影响，哥本哈根的社交活动比较沉闷，但还是有一些小型的聚会，每逢聚会，可以见到外交使团人员和丹麦的一些人物。法国驻丹麦公使与我原来在北京就认识。挪威公使是外交使团的团长，和蔼可亲，他告诉我许多当地习俗和礼仪。意大利公使和夫人喜欢款待客人。英国公使也很好客，他曾在波斯（伊朗）工作过。俄国在丹麦只有代办，这位代办的夫人脖子上挂着一大串珍珠项链，颇似清廷帝后所佩朝珠。

---

<sup>①</sup> 中进士者未必能入翰林院。进士的前三名和进士后的馆选成为庶吉士的人，才可称翰林。——译者

大战期间，扎鲁(Zahl)政府一直执政，可能创下了执政最长的记录。其解决失业问题的政绩，使其在选举中屡屡获胜。外交大臣比较年轻，但聪睿能干，成功地在两大交战集团之间周旋，不开罪任何一方，始终保持绝对的不偏不倚。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紧密团结在一起，毫无疑问，这种联合一致可以帮助他们保护自己不受交战各国的侵犯。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使他们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利益，在哥本哈根可以看到人民生活富裕、市场繁荣的景象。比较而言，劳动阶级可能受益最多，从皇家歌剧院观众座位发生巨变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原来工人进歌剧院总是坐在顶层楼座，随着战争的继续，工人观剧时的座位移到了前排，甚至是包厢里，而那些贵族和“白领”阶层则坐到比较便宜的位子上了。每逢星期日，工人们还穿上名贵的服装，骑自行车到郊区去旅游，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劳动者。在哥本哈根郊区的别墅居住了几个月，通过对附近一些工厂的观察，粗知工人们的生活状况，我们深信他们的生活比起欧洲其他国家人民的生活都优越，至于我国与之简直无法相比。当然，丹麦援助失业人员的政策是否为明智之举，有待研究，因为往往是男子留在家中等待救济，妇女外出工作挣钱，这似乎是在奖励懒惰，而且会令男人变得缺乏责任感。

丹麦虽是君主制国家，但国王和皇家成员都非常民主。国王在繁华街道上行走，几乎没有陪同，由于他身材高大，极易被认出，随时有人向他敬礼致意。王后常常去逛大百货店，她虽原是德国公主，但决无贵族习气。国王和王后深受人民爱戴。国王陛下住在靠近霍尔特的乡间，有时我们乘车进城时，会在中途相遇。

在远东，除了中国和日本以外，丹麦与暹罗(泰国)的关系较深，许多丹麦人服务于暹罗海军，总而言之，像丹麦这样的小国，在

远东能有如此广阔的商业和其他方面的活动，实属非凡。

在城中的蒂沃里休闲公园里，有一座精美的中国式建筑——露天戏台，面柱以木制对联装饰，上面刻有笔道娴熟遒劲的汉字。事实上，丹麦诗人曾将一些中国古诗翻译成丹麦文，流传一时。早年，丹麦曾派传教士来华，因而带动人们对我国文化的兴趣。

由于职务所需，每年我必须访问斯德哥尔摩一次，回来时经过克里斯蒂安尼亚（即今奥斯陆。——译者注），顺道游览挪威。战争期间，瑞典缺少食品，瑞典人常常到丹麦去饱餐一顿丰盛的饭菜。过去以农业为主而常常被瑞典和挪威瞧不起的丹麦，战时却由于其农产品的充足而变得深受欢迎。这便是因战争而导致的兴衰变迁。

瑞典自宫廷以至民间，生活模式比较贵族化，挪威更像丹麦，比较民主。挪威王宫建在克里斯蒂安尼亚郊外小山上，国王经常乘普通车辆从宫殿中出来，还常以和蔼可亲的口吻与司机聊天。一位某国外交官告诉我，他递交国书后，正在王宫里参加午宴，一个身穿毛衣的小男孩突然闯进来，非要看看这位东方客人。这个小孩就是王太子。另一位外交官与挪威外交大臣商谈递交国书日期时，他的话音刚落，大臣就拿起电话直接打给国王，问他什么时候有时间举行这个仪式。在挪威首都期间，我有幸在皇家大戏院观看易卜生的名剧，演员表演生动精彩，遗憾的是我的听力不佳，听不懂台词对白。

我费时一周乘汽车游遍了丹麦各地。每天要旅行 6 个小时。我们乘摆渡过海到达菲英岛，留宿一夜，再乘船到日德兰，穿过该半岛到达北海海岸。日德兰半岛地形起伏，到处是茂盛的树丛，非常漂亮。古老的丹麦城镇别具特色，颇似荷兰村庄。丹麦的夏季

令人心旷神怡，天朗气清，凉爽宜人，阳光充足，道路平整，旅行倍感舒畅。建筑风格独特的乡间旅馆虽然较小，但窗明几净，还有美味佳肴和良好的服务。当地居民都非常热情好客。

灾难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要结束了。宣布停战后，各方皆大欢喜，尤其是像丹麦这样的中立国更为兴奋。大战期间尽管该国经济繁荣，但人们疲劳过度，神经紧张。外交总长陆徵祥先生来电，命我准备参加即将召开的和会，我国将与协约国出席此次和会。各国出席和会的代表人数尚未公布。就中国而言，外交总长建议，有关的外交使节，包括我在内均应派为出席会议的代表。后来为与当时已经宣布独立的广东军政府达成妥协，给世界一个团结的中国形象，以便一致对外，所以又修改了代表团名单，陆先生请我改任代表团顾问，这已经违背了陆外长的个人初衷。不久宣布了和会日期，我接到通知动身去巴黎。

我先到达挪威卑尔根港。一战期间，这里是一个重要的港口，人们由此往来于欧洲大陆和英国、法国之间。之后，我又乘船到纽卡斯尔，中途遇到大风，北海水浅，船身晃动剧烈，客轮整夜都开足了马力向前行驶，实际上船却裹足不前。大海波涛一直撞击着甲板，乘客只能呆在卧舱里。抵达纽卡斯尔时，伦敦使馆代办在岸上迎候我们。去英国首都的路上，经过几座极富特色的城镇，例如有着著名大教堂的约克市。后来，我们又乘船横渡海峡到达法国的加来。这段航程异乎寻常，海面上漂浮的水雷四处游荡，随时可见，乘客必须身着救生衣，以防万一。不过我们没有遇到任何危险，安全到达了目的地巴黎。

我国代表团满怀希望前来参会，不仅想从同盟国那里得到战争赔偿，同时欲借机调整与战胜国之间的关系，以做为我国参与此

次战争的报偿，但结果却大失所望。段祺瑞任总理时的中国政府，应美国政府的请求参战，但却没有得到协约各国的明确许诺，签署各种应享受的权利和应尽的责任、义务的文件。结果在巴黎和会上，我国要求恢复的权利，如关税自主、收回租界、取消治外法权等，均遭漠视，与会列强不予考虑。甚至将青岛的胶州湾租借地直接归还中国的要求，也因英法与日本有秘密约定而未能实现。而日本在与中国达成谅解前将拥有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如此一来，与正式承认日本当年武力胁迫中国同意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何异。

美国总统威尔逊对英法与日本的密约一无所知，直到他与克莱蒙梭、劳合·乔治相见会谈时才知其情，难免大吃一惊。秘密条约的公布就像抛出一颗炸弹一样，中国代表团和中国人民对这种背信弃义的阴谋手段毫无防备。整个事情的经过，我国代表团采取的立场以及会议最终的结果，众所周知，不必赘言。所遗留的复权问题待到1922年华盛顿会议时，方由我国重提进行讨论和解决。据说当初有人向段祺瑞总理进言，中国政府参战应与协约国签定文件，保证战后可得到列强许诺的利益，不能仅仅依赖不明确的或多或少的口头允诺。段总理则回答，他和君子打交道，这样防范实在没有必要。

不过，在巴黎和会上，我国政府在历史上第一次全面阐述了我国在对外关系方面正当、合理的希望与要求。虽然这些要求当时没有得到圆满解决，但是此次陈述的内容日后一直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点，通过日后的坚持不懈的努力，许多要求最终还是得到解决。顾维钧博士是国际联盟盟约起草委员会的成员，成功地将一些基本原则如保障集体安全，主持国际公正，促进世界安全，推行

民主政治等列入盟约之中。我国对起草盟约的贡献巨大。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中日之间因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是否让给日本的问题，僵持不下，结怨甚深，但在起草国际联盟盟约中，日本提出种族平等原则应予列入约章，与中国代表团的想法一致，特予支持。中国有句古训说得极是：君子不因人废言。在和会上最轰动的事件，莫过于中国代表团全面公布了中日之间缔结的各种借款密约。其中一些密约，乃是日本威逼利诱，迫使中方签定的。众所周知的、由日本财阀西原龟三出面谈判而得名的西原大借款<sup>①</sup>就是如此。日本政府对中方公布密约提出抗议，认为中国代表团违反惯例。中国政府声明，代表团为维护中国的权益而采取的正当措施，有助于保持国家独立自主，任何外国无权干涉。经过这样声明，上面所提到的密约得以公诸于世。

有一些情况我不能不提及，但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则，我下面所述会有所保留：当时代表团主要成员中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首席代表缺乏整肃纪律的能力，代表团成员不能合衷共济，令行禁止。几乎人人都了解代表团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即使竭尽全力，忠于职守，通力合作都难于挽救困境，何况他们为大量的琐碎之事争舌辩之快，徒费时日，令人悲哀。代表团还有部分成员热衷于阴谋诡计，争权夺利。

巴黎和会的结局对我国来说是悲剧性的。未等和会结束，我就返回了哥本哈根。当时我已离开家乡 7 年，决定回国省亲，外交部次长陈箓先生批准了这一请求。离开丹麦之前，我先去柏林处

---

<sup>①</sup> 指 1917 年至 1918 年日本人西原龟一一手操办的、段祺瑞政府向日本政府进行的一系列借款。——译者

理私事,到柏林之后,发现德国马克暴跌,例如,同样材质、同样裁缝店所制的服装价格已经上涨了 20 倍,其他的日用品也是如此。本人亲历过一事,足以证实当时通货膨胀使马克跌到离谱的地步。大约 1921 年,我在北京收到一封从柏林的银行寄来的信,信封面上所贴邮票的面值为 100 万马克。邮资竟将我在此银行账户的存款全部耗光。其实,我在银行存款数额当初也算是很可观的。另一方面,柏林至少表面上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人民,尤其是中产阶级变得十分穷困。一位外国使节告诉我,他认识的一位高级德国官员在会见他时竟然穿着一件衣领严重磨破的衬衫。当地的高楼大厦售价低廉,我斗胆向外交部建议,给使馆购买一栋新楼,尤其是当时中国银元兑换马克极为有利,但是令我惊讶的是,该建议被否定了。甚至一些亚洲小国都在利用这个有利时机购买相当豪华的房屋供使馆使用。而我国使节虽已升为大使,仍不得不住在库弗斯丹达的破旧房子里。

由于随行人员较多,全乘大邮轮有困难,所以我们不得不乘丹麦商船,途经直布罗陀和苏伊士运河直达上海。在大西洋上看到一些漂浮的水雷,所幸的是我们一路平安无事。由于是货船,船上总共有 10 名乘客,一路上看书、游戏,时间过得飞快,航行了 40 天,我们安全抵达上海。

尽管上海是我的故乡,但已多年未归,它的发展和变化令我几乎不认识了。昔日的空旷原野,如今全是建筑物,闹市区则遍地是新建的高楼大厦,看上去几乎像到了美国的城市。

我向来关注中外关系方面的事务,因此未公开身份,以一名来访者身份参加了一次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开庭。法庭自革命以来,仍保留了前清时由上海领事团管理的不正常体制。我一位朋

友之子被外国巡捕指控犯有轻罪,请我出庭证明他平时的品行。辩护律师在法庭上通知中国审判官由我作证,该法官在众人面前认出了我,很是吃惊,因此最后判决释放那位年轻人。同庭审判的还有另外一人,被指控犯有偷窃罪,几乎未进行审问和辩护,仅由市政警察提供证词,外国陪审记录,就判处该人几个月的监禁。后来我将此事通告英国驻中国使馆参赞,严正指出会审公廨在外国人操纵下,亵渎了执法公正,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我得到的回答居然是:“这个人乃是惯偷,有长期的偷盗记录,故不必细审即可照例判罚。”

赴杭州时,特意一游莫干山。该地亦被洋人青睐,建有避暑区,并自组管理机构,享有治外法权,这种作法侵犯了中国主权。我与一位旅店的德国老板聊天,这位老板曾在中国海关工作过多年。我问他,在他眼里,中国最明显的进步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是中国年轻女子。在杭州大街上往来的女中学生,身着整洁的制服,举止从容大方而稳重端庄,显得活泼快乐。”后来我转去汉口再回北京。经过鸡公山时略作停留,该地也有洋人的避暑场所,大部分设施属于教会,也同样存在着类似莫干山那里的管理机构,无疑也属于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为此中方应该提出交涉。

北京当时直皖两系军阀之间的冲突已趋白炽化,尽管徐世昌大总统极力斡旋,想方设法欲将冲突平息,但局势依然严峻。靳云鹏将军辞去国务总理后,由海军上将萨镇冰署理国务总理。我晋见大总统,汇报欧洲形势,他不时提出问题垂询。看上去他对于国内冲突显得忧心忡忡。1910年他担任前清军机大臣时,我见过他一次,但这是他第一次和我长谈。他的气度、人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自民国肇兴以来，内战接连爆发，给百姓带来灾难，也有损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与声誉。何以内战连绵不绝，令外国观察家迷惑不解。在此不妨略作回顾，找出内战的缘由（只到1920年）。首先追踪几位大总统成功的足迹，了解他们的背景以及所代表的集团利益，进而探明他们为什么被拥戴，又为什么失势，如此等等，人们或许能清楚地认识到近年来中国内乱不安的原因。

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是孙逸仙博士（1912年），他被誉为中国的华盛顿。前几章中已经叙述了他当选和辞职的过程。为了拯救国家，避免长期流血战争，他牺牲了个人的尊荣和政治权力，把大总统之位让给了袁世凯。袁是河南项城人，中国新式军队的主要创建者，军队中大部分将领和士兵都是北方人，来自直隶、河南、山东等省，他拥兵自重，逐渐奠定了公认的个人领袖地位，更主要的是逼清帝退位，促成共和，提高了他的政治声望，加上他工于心计，长于机变，终于获选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1916年他去世以后，由副总统黎元洪将军继任，他是湖北黄陂人，虽然也是军人，但不像他的前任，他不属于任何派系。此公忠厚爱国，诚实正直，不过才智平庸，缺乏管理国家的能力，军方和文官集团亦不真心相助，因此，他不能成功地治理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新当选的副总统冯国璋将军，直隶河间人，亦系北洋军阀健将，曾任江苏省督军。黎大总统时代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将军，安徽合肥人，与冯国璋同样出自袁世凯门下，继而成为北洋军阀的领袖。他是典型的军人，朴素、勇敢，处事果断，作风强硬，对其心腹常常偏袒，不问是非，一惯迷信武力，不相信议会讨论对国家管理的作用。

不久，黎大总统和段总理之间演成府院冲突悲剧。二人性格、

作风、思想迥异，对待国内外事务的处理方法各执一端，不能协调一致，终因对德宣战一事而水火不容，导致决裂。1917年7月，张勋乘机率兵入京，拥戴小“皇帝”复辟，迫使黎大总统避难于日本使馆。此时，段将军因与黎大总统意见不和，已经辞去总理，退居天津，静待事变。他终于握住良机，组织讨逆军，驱逐张勋，从而建立再造共和之功绩，重登总理之位。

民国政府恢复以后，由于局势混乱，黎元洪无颜留任大总统，因此，辞职退居天津。依法，由副总统冯国璋继任大总统，以待下次大选。冯大总统和段总理同属北洋系，似乎可以同舟共济，造福国家，人们对此期盼殷切，但是二人政治观点殊异，由朋友变为对手，时生龃龉，情势渐坏。对于如何统一南北，冯大总统赞同和平调解，而段总理主张武力征服。普遍认为即将进行的大总统选举，可以决出两者的胜负。

袁世凯大总统所遗留的合法任期（1912—1918年）中经过了两次空位继任过程。即将召开的第二届国会将选举新的大总统。当时认为最重要的两位候选人是冯国璋和段祺瑞。而第三位候选人则是前面曾提到的徐世昌，一般认为他当选的希望渺茫。奇怪的是，在1918年9月4日当选的竟然就是徐世昌。

有关新任大总统的资历，在此不妨略作介绍，有助于了解他与北洋军阀的渊源。他是翰林出身，年青时像那时的许多人一样，在县衙门做过官差，后帮助袁世凯训练新军，现任的许多高级将领昔日都是他的下属。他任东三省总督时，张作霖尚是一位属下末将，所以直、奉两系都把他当作朋友。在缺乏更合适人选情况下，拥护中立的候选人可以使政局有回旋余地，为僵持各派所接受，因此在第二届国会选举中，他在436张选票中得到425张，当选为民国大

总统。

毫无疑问，公众久已厌倦军阀之间频繁的自相残杀，盼望文人执政。徐大总统当选，以其年高望重，在前清、民国丰富的地方、中央的从政经验，足以担当此任。他学识广博，能力非凡，再加上与各系军阀关系深厚，实为大总统最佳人选。

袁大总统任期内，南北冲突不断。1913年二次革命期间，被逐的国民党人、那些南方的军人领袖们曾与袁世凯进行了一场内战。稍后，袁世凯推行帝制，导致了护国战争，他被驱赶下台。黎元洪当政时（1916—1917年），发生了张勋复辟，在武力胁迫下，黎大总统解散了第一届国会，致使议员纷纷南下广州。战乱加剧了民族危机，酿成南北分裂局面，这一局面直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才告结束。尽管冯大总统在1917—1918年间对南方政府执行慰抚政策，但北京政府一直没有中断对南方的军事讨伐。

徐世昌任大总统期间，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与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公开分裂，冲突日趋尖锐，尤其是军阀之间分赃不均，惟有兵刃解决，战争难以避免。加上段氏的亲日政策引起国人不满，遂成政敌攻击的目标。1920年10月，直皖战争爆发。直系很快取胜，段将军辞职，赴天津隐居。

我在北京述职结束以后，赴天津等待局势转稳。直皖战争结束后，徐世昌大总统遂令重组内阁，靳云鹏任总理兼陆军总长，周自齐先生任财政总长。由周先生推荐，靳总理请我出任外交总长，我接受了这一任命。其时，直系由曹锟和吴佩孚两将军统领，与奉系张作霖将军联合控制了全国大局。